

知识人类学的研究历史与趋势*

□[美]戴尔·埃尔克曼/著,杨忠学,杨德亮/编译

[摘要] 知识人类学与现代社会科学一样,产生于 19 世纪,主要致力于解释知识是如何被生产以及如何用于交流的。20 世纪 70 年代,知识人类学将语言模式的文化价值认知纳入自身体系中。20 世纪晚期以来,知识人类学主要关注文化交流的意义以及社会价值知识如何被生产出来等相关问题。当下,知识人类学与心理学、地理学等学科相结合,进行跨学科的合作,探究大众化和制度化的文化表达,关注知识的社会再生产以及权力、价值、交流和控制等内容,日益成为人类学中的一个重要领域。

[关键词] 知识人类学;文化;智力研究

[中图分类号] C912.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8179(2019)01-0133-06

知识人类学的研究发端于 19 世纪,并在社会研究中起着重要作用。20 世纪末,知识人类学与其他学科产生紧密关联,这种关联尤其体现在主观认知与科学的联系性、知识是如何被习得和交流的等方面上。

随着全新的知识人类学的框架结构建构起来,一些学者已经涉及对特殊的社会和文化群体进行田野民族志的基础分析,探讨一些群体如何利用知识使自己比其他人更中心和更具有合法性(这在殖民地和独裁者的设定之中)。

从 20 世纪 70 年代开始,知识人类学包含大量的文化价值类型——大量基础的、隐晦的、综合性的语言模式,并且包含其他知识模式,以及一些被定义、被转化的思想。同样,(他们)关注这些知识模式如何形成,如何被合法化,同时还关注权力的配置和群体的经济分配等相关问题。

20 世纪末,知识人类学研究的重点已经从关注文化传统中的人类学类别和流派研究——争论人类和其他物种的普遍性,逐渐转移到文化交流的意义和传统文化内容的研究当中,以及他们还研究社会价值理念如何被生产出来,如何被合法化,一些被强加在别人身上的特殊意义(这些存在于殖民者的设定之中)。这是“关于知识的思考”,知识人类学最近已经被提出,人类学家开始与脑科学家、生物学家、营养学家、历史学家以及哲学家展开密切的合作(Marchand,2010)。记忆和遗忘对于个体而言,与群体的记忆和遗忘存在很大差异,因为群体记忆的形成通过食物、形体塑造、风情景观、宗教仪式以及纪念物来建构(Assmann,2011)。

一、19 世纪末 20 世纪早期的研究流变

19 世纪,大多数知识性的问题构想集中在整个社会群体共有的部分,同时,他们积极地阐述本土化和情景化以及他们共有的东西,这已经超出了社会自身特殊性的限制。因此,土著的澳大利亚人的知识依赖于当地景观和本土成年人来塑造,这些成年人已经在他们的生活圈子里获得身份认同,在成年期间,他们能从其他人创造的景观中得到借鉴,并通过“转变创造行为”来实现(Tonkinson,2011:331)。诸如几何学、数学等其他知识形式,我们视之为抽象知识。而这些知识不会局限于特定的人群、特定的地点,甚至可以超越以往的研究。早期的知识人类学的框架存在较含蓄的而又精确的假设,这些假设是为社会发展而提出的。例如,

* 收稿日期 2018-07-01

编译自 Knowledge, Anthropology of. In: James D. Wright (editor-in-chief), International Encyclopedia of the Social & Behavioral Sciences, 2nd edition, Vol 13. Oxford: Elsevier. pp.70~73. 经原刊和作者授权翻译,中文版在本刊首次发表。翻译时有部分删减。

从简单的元素到复杂的社会,从达尔文普遍进化论到卡尔·马克思的实践都是按照这种方式操作的。因此,史密斯(William Robertson Smith,1972)的研究对以后的社会学家和人类学家产生深远影响,其中包括涂尔干、埃文斯-普里查德,他们看到一个社会群体的发展阶段与他们的头脑中的知识、宗教和精神生活存在密切关系。譬如,史密斯认为,想理解先知伊齐基尔(Ezekiel)的言辞,就必须理清他在时代当中的社会组织,以及当时的宇宙观、那一代人的思考方式。如果发现伊齐基尔言辞与塞缪尔的言辞有异也是不足为奇的,这在圣经的解释方面并不存在任何矛盾,只是因为塞缪尔自己对这个群体和人的不同阶段发展情况做出的理解不同。

在历史时期的社会形式当中,社会形式的演变具有双重意义,并且这一理论成为涂尔干和他的侄子莫斯共同执笔完成的著作《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1915)和《社会分工论》(1963)的基本观点。涂尔干致力于研究社会形式的组成元素,目的是认识基础的社会元素之外的时间、空间和因果关系的逻辑结构,以及人与人之间的联系。他以自己认为是证明社会组成元素最好的材料的澳大利亚土著人为例,认为宗教思想像所有的社会形式一样,起源于社会行为。

涂尔干力图综合两种主要的方法即先验主义者和经验主义者,去理解思维。先验主义者的方法,由康德(Immanuel Kant)的例证说明思维的种类存在于人们的内心。经验主义者的方法是通过洛克(John Locke)的例证说明这些思想种类来源于经验。随着个体相似观点的建立,涂尔干将二者的方法综合起来,他认为,理解的方式既不是固有的,也不是源于个人经验,而是集体意识的产物,这种意识通过共有的仪式行为由人们创造和维系。社会知识的基础和分类被应用于客观层面和世界本质研究之上,诸如宗教思想,至少是社会初级层面上。这就是解释澳大利亚土著人成为知识具体化代表的原因——风景、仪式、时间和地点的连接在思维框架当中,以及个体和群体之间的关系——这一点值得关注。

对于涂尔干来说,他关注集体意识(意识的集体性),从中做出基础性的假设和集体意识的概括。涂尔干的理论更为先进,但是,就综合欧洲社会哲学的主要观点方面来说,他在阶层形成的原因方面,表现出解释社会的基础理论的能力不足。总之,他的观点表明一种社会秩序和知识类型的类比,并且他的心理假设理论很快被取代。此外,他的观点成功地影响了一代人类学家,这些人类学家成为关注田野民族志的典型代表。

二、田野民族志知识的发展演变

20世纪上半叶,埃文斯-普里查德和涂尔干的研究乃是经典之作,尤其是他们的田野民族志。比较典型的是埃文森·普里查德关于苏丹南部努尔人的研究(1940),在他的文章中,普里查德没有引用前辈学者的研究成果,他主要阐述努尔人以畜牧业为生,从而揭示他们简单的精神生活、最基本的社会形式和政治制度的不同,他们当地的环境和移民具有较高的独立性。普里查德描述这些细节,暗示了这里的生态状况如何塑造努尔人的社会生活和宇宙观、宗教思想、逻辑思维和事物的秩序。他认为,努尔人的语言结构,年龄—性别和政治结盟,与他们时间的意识、空间、政治关系具有一定的联系。

像涂尔干、普里查德,他们允许读者去寻求一个比较客观的事实,努尔人的种类、阶层源于他们的社会和政治生活。然而,与涂尔干相比较,普里查德的观点基于传统的社会结构、时间意识和宇宙观,从而建立一个普遍的模式或者同源的形式上。普里查德展现出来人类学的传统,以及他在20世纪中叶学界的主导地位,激发了学界对其他非洲社会中宇宙观和社会结构的研究,如米德尔顿(John Middleton)对于乌干达的卢格巴拉人的探究,以及戈弗雷(Godfrey)关于苏丹南部的卡丁人的探究。

涂尔干的理论影响深远,甚或影响到了其他人类学家的实践,例如利奇和道格拉斯(1966)。人类学家开始关注基于动物、植物、性别、食物、人和其他类型的活动,以及维持种类的分界或者展现边界的范围。列维·施特劳斯(1966)聚焦于阶层模糊类型的研究,即谱系结构和社会初级神话的研究,他探索相似的神话之间有普遍联系的文化传统,例如,通过语言结构,寻求与之相类似的结构。列维·施特劳斯的研究拓宽了研究不同文化领域的维度,开辟了类比的研究方法。

诸如戈德利耶(Maurice Godelier,1986)的一些研究,把涂尔干关注的类别和阶层的研究引入到马克思主义理论当中,知识思维从而具有了结构性。然而涂尔干的研究仍然强调知识体系和类比方面分层的模糊性,显性的符号、材料或者经济生活,而不是人们如何创造、增加以及改变知识的方式。

三、心理学、脑科学和人类学的结合与分野

直到 20 世纪 20 年代,心理学和人类学大量地交叉起来。正是心理学家、人类学家引入比较研究的方法,致力于研究人的思维相似性的科学探索。一些人类学家表明,人的智力和认知过程是有本质的相似性,以及他们只有文化发展程度的多样性。另一些人类学家,例如法国哲学家列维布留尔(Levy Bruhl)表明先理性^①的思维形式和原始的思维形式,和现代社会的理性思考具有巨大的分野。列维布留尔的理论对于法国殖民地当局有很强的说服力,他甚至提供一种假定:非洲北部的穆斯林社会,应该是没有能力去放弃社会形式和信仰的支持,基于此,进行殖民地的社会转型到现代世界的过程中,不能肆意分离传统和现代。

然而,20 世纪 20 年代之后,有大量的研究把心理学和人类学方法分离开来,抛开心理学家、人类学家探索出认知的理论和方法,以及探索关于个体学习、分类与此相关的类比过程的研究,去认知知识。因此,心理学家关注大脑如何处理思维的过程,其中包括学习语言的能力;人类学家则更多地聚焦于知识和阶层的文化学习方式。只有一些人类学家诸如白特森(Gregory Bateson,1972)不断扩大两个学科的研究范围。

斯佩贝尔(Dan Sperber 1985)指出,人类学家的工作总是有两种路径。一些人类学家有更多的兴趣从事解释和分析特殊的文化和社会群体方面研究。另外一些人类学家总体上更关注于文化的形式和人的性情。知识人类学的研究,逐渐变得众所周知,更加强调这种区别。这些人类学家大多数倾向于探索人类学与心理学之间的关系。20 世纪 60 年代又有学者将两种学科进行紧密结合。例如,一项关键性的研究——对于颜色的看法,之前的人类学家假设是文化转变——即在一个有限的多样性范围内的认知已经不符合最初的假设,潜在的认知原理得以展现(Berlin and Kay,1969)。

涂尔干关注点在于知识人类学传统的外部结构——阶层模式,即我们对于如何理解社会和世界有关的秩序。知识人类学家的研究在于知识结构的内部秩序——例如,植物学中的颜色、疾病类型、谱系和体系之间的关系。科尔(Michael Cole,1996)宣称他重新将心理学和人类学结合起来,名之为第二心理学。两种学科共同探索文化和理解认知发展的思想,文本和自然科学的进步之间的关系(Wagner,1993),以及语言的习得的方式。例如,多罗西赫兰和纳奥米奎恩(1987),使用这种模式去思考活动模式的标准:一个人到邮局通过一个社会学习文化模式并且形成制定日常路线的习惯,从中释放个人的特殊性。

四、智力研究

另一种知识人类学的组成部分,包括社会的智力角色以及社会知识的生产。最近十年,人类学家通过社会所有成员的关注基础的文化知识形式。诸如人类学家拉丁(Paul Radin,1957)在美国人类学界和克里奥勒(Marcel Criaule,1965)在法国传统社会,将智力描述成一种拥有他们社会神圣中心的特殊意识,以及一种反应、解释知识分类的能力。维克多·特纳(1967)在一篇经典的论文里,与牛津大学相比,关注了知识和他的一个重要的恩登布人象征主义报道人的角色,也打破了那种认为个人知识生产者被统摄到更大集体当中的早期传统。

希尔斯关于现代化与现代性关系的理论,是一种很有效的界定智力的进路(Edward Shils,1972)。对于他而言,所有智力最初源于宗教活动,但是,在现代那些有创造力的精英越来越多关注现代化取向而非宗教取向。希尔斯的方法假设认为,并不是所有的知识都是平等共有的,并且他鼓励人类学家和其他学者去思考智力的多种类型,和他们的不同政治以及知识被生产和被赋予意义的社会内容之间的关系。与此同时,人类

^① 先理性,主要是指没有获得知识的先天思维,译者注。

学家转移关注点,逐渐远离辨别阶层的类别和宇宙论的研究,关注经济的发展方向和那些被生产的知识、塑造的政治内容。

在理解知识及其社会分类的转变中,作为过程和历史根基,这种方法的目的是为了全面地理解社会的本质——去除引用涂尔干的理论——被用来描述复杂社会中高级知识的概念。因此,布迪厄(Pièrre Bourdieu, 1976)从巴黎大学习得的比较认知类型的知识,这种知识是通过对博罗罗老年人转移到亚马逊案例进行分析得出。对于布迪厄来说,通过在巴黎大学为学生准备一种装备称为“Lecon”,即一种口头的习得的知识,在法国通过“正确”的编排智力活动,论证得出博罗罗乡村存在大量的二元空间布局。Lecon 的二元方法,加强了关于任何客观事物两种观点的思考方式。这种方法被大量运用在大范围的智力问题的讨论当中,用来排除二选一的选择,以及很少有文化价值的筛选。但是,布迪厄将巴西亚马逊博罗罗乡村宗教的认知方式和法国、德国的认知类型做出比较,试图去揭示生活在底层和更高阶层社会中的人们如何进行思考的问题。从 20 世纪 90 年代起,他们越来越强调在认知的共有因素:“形体、认知、神经和社会原理,它们是允许随机性的调动知识,可以有效地结合转变(科恩,2010:194)。”学科概念的差异有多少被加在不同因素之上,因而他们增加辨别了复杂任务,以及学会倾听、观察、编排、执行以及交流的过程。埃尔哈纳指出,30 多年来,很明显西方和非西方、传统和现代、主观和科学、文本和非文本存在很大间隔,这种间隔体现在依靠内容和思考的过程。这种区隔是不清晰的,即使从 17 世纪的欧洲科学革命的角度来看。埃尔哈纳认为,一种思维模式并没有被另一种完全抹杀,而且思维模式有很多构成要素“随着时间的推移,不同文化之间的变化而变化”(Yehuda Elkhana,1981:27~28)。

五、知识和权力

20 世纪 60 年代,布迪厄关于教育、社会阶层和知识的研究,不但将一些关于知识人类学长期存在的主题联系在一起,同时也表明了一种转变:从早期关注类别的创造方式、方法到知识的生产的具体过程的跨越。诸如布洛克(1985)、法尔顿(1985)、高德利尔(1986)、布迪厄(1977)以及其他相关知识和社会阶层的学者加以区分和进行原因的分析。关于法国特殊教育的研究,布迪厄阐述了法国高等教育研究知识的类型和形式,从社会阶层到学校阶层是如何发生转变,介于阶级和社会资本之间,关注相关符号化的阶层,和正式学校的思维习惯方面的研究。

21 世纪初,转变的历史问题主要在集中于高等教育管理的意识形态,以及在复杂的社会当中意识形态与阶级和社会群体的利益矛盾等是否相关。涂尔干忽视了法国高等教育的发展过程。然而,仅仅在 20 世纪 70 年代,一些思想引起了人类学家的前沿性思考。像布迪厄的关于法国高等教育的研究和其他学者关于内部逻辑和知识性的转变研究,伊斯兰思想的社会内容之类的主题研究(埃尔克曼,1985),以及在印度尼西亚,宗教和传统的统治意识的过程的转变(赫夫纳,1985),引起人类学家在宗教经历方面知识特征的探讨,同时关注公众符号的意义和不同社会和历史环境当中的社会行动者,不断地形塑和再造知识的过程。

像最近的多学科研究,如博厄斯(1987,2002)解释新几内亚高地的传统文化方面的多元性,关注思想、形体和知识,以此区分基础和复杂的社会,以及深层次的知识塑造和知识的积淀。利用仪式场合创造和改变知识的体系,在西方社会当中,越来越多的研讨会和创新课程完成了一些类似的研究课题。其中部分来自早期的研究,例如,普里查德关于努尔人的研究,博厄斯关于知识体系内部的思想过程和创新及其所产生的多样化知识的研究。

博厄斯的研究方法和汤金森(2011)关于澳大利亚土著的研究,对于文化思维和知识也有深刻的影响。他们不仅批判文化和知识的塑造,而且揭示知识内部的同源性、共有的、边缘化的联系,以及他们关注的社会组织之间交流的关系在个体知识再造、改变以及符号化过程的作用。

因此,知识人类学当前有两种发展趋势。一种是基于人类学、心理学、地理学以及其他学科合作基础上,探索将公共和制度化的文化表达及认知与心理表征联系起来的新方法(Shore,1996)。另一种则集中在知识

的社会再生产以及权力、价值、交流和控制方面。早期对价值观、宇宙观和认知方式的关注,在一个特定的社会中,是所有人共同拥有的,但现在已经让位于思想和创新如何在更有限制和更明确的知识领域中进行交流。这些研究包括知识和思想在硅谷、基因组计划和生物遗传工程中传播,研究还考虑了新传播媒体对宗教和政治权威思想的影响。在性别、性、权威和责任的隐性共享观念中所体现的变化过程,也是知识人类学当前关注的一个组成部分。☉ [责任编辑 胡宝华] [专业编辑 秦红增] [责任校对 石彬筠]

[参 考 文 献]

- Assman, J., 2011. Communicative and cultural memory[A]. Meusberger, P. Herffernan, M. Wunder, E (Eds.). Cultural Memories: The Geographical Point of View[C]. Springer, Heidelberg
- Barth, F., 1987. Cosmologies in the Making: A Generative Approach to Cultural Variation in Inner New Guinea[M]. Cambridge,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Barth, F., 2002. An anthropology of knowledge[J]. Current Anthropology, 43.
- Bateson, G., 1972. Steps to an Ecology of Mind[M]. Ballantine Book, New York.
- Berlin, B. Kay, P., 1969. Basic Color Terms: Their University and Evolution[M]. Berkeley,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Bloch, M., 1985. From cognition to ideology[A]. Fardon, R. (Ed.). Power and Knowledge: Anthropological and Sociological Approaches[C]. Edinburgh, UK.: Scottish Academic Press.
- Bourdieu, P., 1967. Systems of education and systems of thought[J]. International Social Science Journey, Vol. 19.
- Bourdieu, P., 1977. Outline of a Theory of Practice[M].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Cohen, E., 2010. Anthropology of Knowledge[J]. Journal of the Royal Anthropological Institute(N.S.).
- Cole, M., 1996. Culture Psychology: A Once and Future Discipline[M]. Cambridge, UK: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Douglas, M., 1966. Purity and Danger: An Analysis of Concepts of Pollution and Taboo[M]. Frederick A. Praeger, New York.
- Eickelman, D.F., 1985. Knowledge and Power In Morocco: The Education of a Twentieth Century Notable [M].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Elkhana, Y., 1981. A programmatic attempt at an anthropology of knowledge[A]. Mendelsohn, E. Elkhana, Y. (Eds.). Sciences and Culture: Anthropology and Historical Studies of the Sciences[C]. Kluwer, Boston.
- Evans—Pritchard, E.E., 1940. The Nuer: A Description of the Modes of Livelihood and Political Institutions of a Nilotic People[M]. Oxford, UK: Clarendon Press.
- Fardon, R.(Ed.), 1985. Power and Knowledge: Anthropological and Sociological Approaches[M]. Edinburgh, UK.: Scottish Academic Press.
- Godelier, M., 1986. The Mental and the Material[M]. London: Verso.
- Hefner, R., 1985. Hindu Javanese: Tengger Tradition and Islam[M].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Holland, D. Quinn, N., 1987. Culture Models in Language and Thought[M]. Cambridge,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Levi—Strauss, C., 1966. The Savage Mind[M].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Levy—Bruhl, L., 1922. La mentalite primitive[M]. Librairie Felix Alcan, Paris.

- Marchand, T., 2010. Making knowledge: explorations of the indissoluble relation between minds, bodies, and environment[J]. Journal of the Royal Anthropological Institute(N.S.).
- Radin, P., 1957. Primitive Man as a Philosopher[M]. New York: Dover Books(Original work published 1927).
- Shils, E., 1972. The Intellectuals and the Powers[M].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Shore, B., 1996. Culture in Mind: Cognition, Culture, and the Problem of Meaning[M].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Sperber, D., 1985. On Anthropological Knowledge[M]. Cambridge,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Tonkinson, R., 2011. Landscape, transformations, and immutability in an aboriginal Australian culture [A]. Meusberger, P. Heffernan, M. Wunder, E. (Eds.). Cultural Memories: The Geographical Point of View[C]. Heidelberg.
- Turner, V., 1967. Muchona the hornet, interpreter of religion[A]. Tumer, V.(Ed.). The Forest of Symbols: Aspects of Ndembu Ritual[C].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Original work published, 1957).
- Wagner, D., 1993. Literacy, Culture, and Development: Becoming Literate in Morocco[M].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作者简介] 戴尔·埃尔克曼,美国达特茅斯学院人类学系教授。译者:杨忠学(1993~),宁夏西吉人,北方民族大学民族学学院回族学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回族社会。杨德亮(1980~),宁夏海原人,北方民族大学学报编辑部副编审,博士,主要从事人类学研究。宁夏银川,邮编:750021。

History and Trend of Anthropology of Knowledge

Dale F. Eickelman, YANG Zhong-xue, YANG De-liang

(North Min Zu University, Yinchuan, 750021, China)

Abstract: Anthropology of knowledge, like the other modern social sciences, originated in the 19th Century, and is mainly aimed at explaining how knowledge is produced and used for communication. In the 1970s, anthropology of knowledge incorporated the cultural value cognition of language models into its own system. Since the late 20th Century, it has mainly focused on the significance of cultural exchanges and related issues, for instance, how social value knowledge is produced. At present, anthropology of knowledge combines itself with disciplines such as psychology and geography to conduct interdisciplinary cooperation, explore popularized and institutionalized cultural expressions, pay attention to the social reproduction of knowledge and the content of power, value, communication and control, which has played an increasingly important role in anthropology.

Key Words: anthropology of knowledge; culture; intellectual research